

胡适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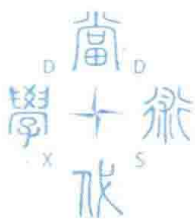
# 国家与学术

清季民初关于  
“国学”的思想论争

海外借

胡适曰  
北京大学  
國學季刊  
第一卷 第一號





---

# 国家与学术

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

---

罗志田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2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 /  
罗志田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9  
(当代学术)  
ISBN 978-7-108-07593-2

I. ①国… II. ①罗…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  
近代 IV. ① B250.5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 (2023) 第 011977 号

特约编辑 孙晓林  
责任编辑 苑琛  
装帧设计 宁成春 薛宇  
责任校对 张国荣  
责任印制 宋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2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2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8.5  
字 数 406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108.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罗志田 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历任四川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现任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兼任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著有《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斯文关天意：近代新旧之间的士人与学人》《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和《激情时代：五四再认识》等。

## 当代学术 总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从1986年恢复独立建制以来，就与当代中国知识界同感共生，全力参与当代学术思想传统的重建和发展。三十年来，我们一方面整理出版了陈寅恪、钱锺书等重要学者的代表性学术论著，强调学术传统的积累与传承；另一方面也积极出版当代中青年学人的原创、新锐之作，力求推动中国学术思想的创造发展。在知识界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已出版众多引领学术前沿、对知识界影响广泛的论著，形成了三联书店特有的当代学术出版风貌。

为了较为系统地呈现中国当代学术的发展和成果，我们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刊行的学术成果为主，遴选其中若干著作重予刊行，其中以人文学科为主，兼及社会科学；以国内学人的作品为主，兼及海外学人的论著。

我们相信，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的繁荣发展，中国学术传统正逐渐走向成熟，从而为百余年来中国学人共同的目标——文化自主与学术独立，奠定坚实的基础。三联书店愿为此竭尽绵薄。谨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3月

## 新版序

本书初版于2003年，那时我从川大引咎辞职转到北大，书出恰逢“非典”，数月后疫情解禁，而京城出现一股“国学热”。一时从刊物到报纸以至于电视台，忽然都对国学有了兴趣。犹忆数月间接到的采访和演讲“对谈”等邀请，每周至少两次。有些邀约者本是熟人，其余也多通过朋友介绍而来。我当然知道参与这些活动必会帮助书的销售，但若频繁“出境”，可能很快就会成为所谓“公知”。且我到京即给自己定了规矩——不在北京演讲。于是不得不拂了各位旧雨新知的好意，闭门读书、教书，国学也就没在我这里“热”起来。

书的版权应是2013年到期，然从2011年起，就有好几家出版社陆续来探询再版之意。初版写作时很多史料如《国粹学报》《政艺通报》等都还难觅，所以书中所引的史料比较厚重，希望让读者可以据史料以验证我的看法。后来那些史料慢慢有了影印本甚至电子数据库，与读者分享的意义就没那么大了。我当时的想法是出一个较大幅度的修订版，将引用较详的史料删略，使书中的见解更明晰，以利更多专业而非“专门”的读者。遂向这些出版社致谢，请朋友们以后再联络。

忽忽好几年过去了，修订事竟未提上工作日程。到2016年，原版的三联书店编辑自己来联系了，说是要放在收纳近几十年学术原创作品的“当代学术”丛书里，就不能不欣然允诺了。虽然如此，起初仍计划不大改也要“中改”。遂开始把原来的自序改写为新序，并从第一章起调整结构，旋又因他事而搁置。这些年真是每天都在“穷忙”，其

实也不知在忙什么。学无寸进，杂事却日多，而文债尤重。转眼续约签了五六年，整体的修订一直没能进入工作日程，感觉实在不好意思再拖了。

实则改与不改，内心都有些矛盾。盖历史叙述当追求“文如其事”，史迹本“变动交互”，史体亦当随之（刘咸炘语）。裁去一些资料固然可以更加清晰地彰显作者的诠释，但历史本身是丰富的，太过简明则可能失真。且即使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历史学人也并未因此放弃史学诠释的责任，而把判断留给读者来完成。就历史撰述言，昔人写作追求的是言有余韵，现代学术也讲究说话要有分寸，在此基础上，要写出流畅通达并富有穿透力的文字，即使不受史料丰约的影响，也是极费斟酌的事。如何可以提供较多的史料以“随人观玩”（陈寅恪语），同时把自己的诠释表述得不那么余音绕梁，仍是我努力的目标。

况且不论是“国家”与“学术”的关联互动，还是“国学”本身，都是近代的大事。它们的前世今生，与20世纪以至21世纪的中国学术、思想乃至政治的变化，息息相关。这些年尽管在做别的题目，相关史料一直在留心，也有不少新的看法和想法，已积累下二十多万字的半稿，故本书即使大改，也未必都能整合进去，或许只有慢慢另成一书了。

经过再三斟酌，乃改变想法，先将此史料丰富的“详本”留给专业读者，以后若时有余裕，再为不那么专门的读者写一个以旨趣见解为主的“略本”。故这一版仅改正已知的文字错误，对个别文字略作调整，舍去尚未完成的新序，仍存原有的“自序”，第一章的结构也仍依旧貌，可以说没怎么改。经过十多年的纠结踌躇，竟是这样的结果，不能不说声惭愧！

从2003到2022这二十年间，对国学的认知以及国家与学术的关系，显然是有变化的。昔年读过此书的人，在二十年后重读同一本书，是否会读出与前不同的新意？甚至2022年的在校大学生，有些就是2003年及其后出生的。本书对他们而言，与二十年前大学生的观感，必有异同；或也只能借杜樊川所言，“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面对不同的语境、变化的读者，本书探讨的问题，既在时间中延

续，或也像歌曲的旋律一样，在重复中生成新的韵律流淌。正如百年前国家与学术的问题，在今天仍启迪着后人。无论如何，本书二十年后再版，对于读者和出版社的厚爱，个人是十分感动也特别感谢的！

2022年3月23日

于川大江安花园

# 自序

近代中国士人面临西潮冲击，在中国已由文变野、实际处于“世界”的边缘甚至未能“进入”世界的背景之下，多数中国读书人都在思考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由于政教相连的中国传统对“学”的强调，这个问题无时无刻不与“学”相关（这是民初读书人常能从“物质”上看到“文明”的一个重要潜因）；反之，当许多人说“学”的时候，其实考虑的、关注的又决非仅仅是学术，而是远更广阔的国家民族存亡和发展一类大问题。因此，从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由此而起的争论开始，到新文化运动时的整理国故，再到北伐前后两次关于国故和国学的大讨论，这一系列论争都以学术为题，却远远超出了“学术”的范围，而形成了社会参与相对广泛的思想论争。<sup>[1]</sup>

这些论争有的已为学者所注意而语焉不详，有的则较少受到学者的关注。如果说清季的材料相对不易搜集，民初几次争论的材料其实并不稀见，而且参与这些论争的人物（特别是新派人物）大多数已经“青史留名”，他们的具体言论似乎仍未受到足够的重视。<sup>[2]</sup>朱维铮先生约十年前曾指出，新文化运动期间《新潮》与《国故》两派的论争，“在学

---

[1] “相对广泛”这一定语应予充分注意，这一系列论争以至我们史学研究中备受重视的清季民初新旧之争，其实都是充满士人关怀、主要在精英之间展开的争论，其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当时全社会的关注，还有待考证。

[2] 据说中山大学历史系正有人以黄节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关于民初的争论，一个少见的例外是沈松桥的《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反新文化运动》（台湾大学，1984年），该书以4页约两千字的篇幅论述了1919年以北大学生为主的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

术上并没有超出”刘师培“当年的主张”。<sup>[1]</sup>这一睿见并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而朱先生该文意不在此，也仅仅点到为止。实则几次论争的观念可见明显的传承（当然也有变化），尤其是各次论争的核心关注点基本一致，但既存研究中基本未见将其联系起来思考和讨论者。

庚子以后，清季朝野皆曾有保存国粹的愿望和具体的努力。民间的“国粹派”近年受到研究者更多关注，直接以“国粹派”或“国粹主义”为题的研究，较早的有杨天石的《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sup>[2]</sup>此后中国大陆学术进入非常时期，倒是美国学者施奈德和伯纳尔分别著有《国粹与知识分子》和《刘师培与国粹》；<sup>[3]</sup>到20世纪80年代则有胡逢祥的《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史学》；<sup>[4]</sup>进入90年代，相关论著渐多，其中郑师渠的《晚清国粹派》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关于“国粹派”最为详尽的研究。<sup>[5]</sup>此外，广义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近代学术史、思想史和具体的南社、同盟会、辛亥革命以及相关人物（特别是章太炎）的

---

[1] 朱维铮：《失落了的“文艺复兴”》，收入其《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132页。

[2] 文载《新建设》1965年2期。

[3] Laurence A. Schneider, “National Essence and the new Intelligentsia”, Martin Bernal, “Liu Shih-p’ei and National Essence”, both in Charlotte Furth,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57–89, 90–112.

[4] 文载《历史研究》1985年5期。

[5] 如吴雁南等主编：《清末社会思潮》的第七章《国粹主义的“复兴古学”》（张恒平执笔），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360—423页；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按：郑师渠另著有《国粹、国学、国魂：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台北天津出版社，1992年，书未见）；朱维铮：《失落了的“文艺复兴”》，收入其《音调未定的传统》，132—140页；丁伟志：《晚清国粹主义述论》，《近代史研究》1995年2期；王汎森：《刘师培与清末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大陆杂志》90卷6期（1995年6月）。王东杰近年有三篇相关论文，即《国学保存会和清季国粹运动》，《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1期；《欧风美雨中的国学保存会》，《档案与史学》1999年5期；及《〈国粹学报〉与“古学复兴”》，《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5期。木山英雄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学人》第10辑，1996年9月）从文学角度讨论问题，亦可参考。与此论题密切相关而值得参考的还有俞旦初的《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和沈松桥最近的论文《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3期（2000年6月）。

## 2 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

既存研究多少都与“国粹派”相关，均不容忽视，此不赘。

不过，由于国粹学派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如学派之内各人观念的异同、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以及国粹与欧化之争等一系列问题仍有许多可以探讨之处。尤其清政府方面保存国粹的相关努力很少有人关注，将朝野的类似关怀结合起来探讨者更几乎未见。实则清季朝野双方不仅有对立的一面，也有共同的一面；在保存国粹方面，有时像章太炎和张之洞这样在政治观念上对立的人，其文化共识的程度或者还超过章太炎与吴稚晖这样政治观念相近之革命党人。

从辛亥革命到张勋复辟，国人似更多关注直接的政治问题。胡适在20世纪20年代初注意到，因古学界青黄不接所造成的学术寂寞使许多人产生古学将要沦亡的悲观，结果“很自然的发出一种没气力的反动的运动来”。<sup>[1]</sup>然而造成那时与“古学”相关的学术寂寞恐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学术”，特别是国人真正熟悉的传统中国学术在此期间基本淡出思想言说的中心。在民初趋新的大势下，一些旧派人物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的努力的确只能是“没气力的反动”。

真正使国学/国粹回到思想言说中心的是五四后新派人物推动的“整理国故”运动。这一当时影响巨大的努力虽然在各种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论著中不时被提到，但不知为何迄今少见专门而系统的研究。陈以爱最近关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新著虽然仅选取一个机构在一段时期（1922—1927）里的发展进行探讨，或可说是这方面第一部比较详细的专著。<sup>[2]</sup>此前较有分量的论文则多侧重于提倡整理国故最力的胡适，然数量也不多。<sup>[3]</sup>新近一些学术史研究对此有较前更具体的关注（即不

---

[1]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卷一，亚东图书馆，1924年，1—2页。

[2]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台北政治大学，1999年。

[3] 李孝悌：《胡适与整理国故——兼论胡适对中国传统的态度》，《食货月刊（复刊）》（台北），15卷5—6期（1985年11月）；耿云志：《胡适整理国故平议》，《历史研究》1992年2期；雷颐：《胡适与“整理国故”运动》，收入其《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185—202页。

仅是提及而已), 尤其桑兵教授对“国学”的研究涉及广泛<sup>[1]</sup>, 但关于“整理国故”的专门研究仍待来者。<sup>[2]</sup>而 1919—1929 年间几次关于国故或国学的思想论争, 既存研究或偶尔提到, 或几乎未见提及, 显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sup>[3]</sup>

从清季起这一系列思想论争最显著的主线是(广义的)学术与国家的关系, 在近三十年间大体经历了从保存国粹到整理国故再到不承认国学是“学”这一发展演化进程。从称谓看, 又大致经历了从“中学”到“国学”/“国粹”再到“国故(学)”/“国学”这一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或可以说, 国粹、国学、国故等词语的大量引入思想言说之中, 恐怕就因为“中学”已经失去吸引力和竞争力, 尤其“国学”明显是“中学”的近义词。章太炎在 1906 年提倡“以国粹激动种姓”时, 他(以及主张以历史激发爱国心的梁启超等)有意无意间不过是换一个标签而试图将在时人思想言说中已经边缘化的“中学”拉回到中心来; 但正由于国粹与中学的接近, 这一努力的成就有限, 或可说基本是不成功的。

就清季而言, 从“中学”而“国学”而“国粹”这一进程当然未必即呈线性发展, 具体到个人则可能还先言“国粹”而后说“国学”。<sup>[4]</sup>但许守微 1905 年发表于《国粹学报》的《论国粹无阻于欧化》一文提

---

[1] 如王汎森的《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和刘龙心的《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 两者均收入罗志田主编的《20 世纪的中国: 学术与社会(史学卷)》,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31—130、449—580 页。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历史研究》1996 年 5 期;《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钟少华的《试论近代中国之“国学”研究》(《学术研究》1999 年 8 期)值得注意, 此文非常规史学论文, 作者自己也介入讨论, 认为昔人“硬把国家同学术绑到一起, 以希望作为抵抗外来传入的新人类知识的武器, 这种徒劳的努力, 历史已经将之废弃了”; 同样, 国学分类的混乱也是因为“将‘国’与‘学’搅拌到一起”的问题没解决好(引文在 31—32 页); 不论其“评价”的倾向性如何, 该文注意到学术与国家关系的重要性, 实有所见。

[2] 据我所知, 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徐雁平和台北政治大学的陈以爱就此为题的博士论文都已在最近通过答辩。

[3] 这一系列论争所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的既存研究, 将在相关的章节中涉及, 此处不作专门的评述。

[4] 参见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 112—113 页。

示着“学”这一称谓至少在中西对立方面已明显改变（详后），章太炎恰在次年鼓吹“以国粹激动种姓”显非无因而至。到1908年，太炎自己在其《规新世纪》一文中已将国粹、国学和国故三词并用，那时基本是作为互换的同义词而避免文字的重复；但一年多后他将其重要著作命名为《国故论衡》，则意味着在意识层面对“国粹”的正式弃用，且多少隐含着“反戈一击”之意：“国故”当然比“国粹”更中性，而“论衡”则义本王充，明显有商榷批评之意。不过，“国故”一词的真正流行还在十年之后了。

对一般人而言，国粹、国学、国故这几个名词在清季民初二三十年间大致为许多人互换使用（清季时一度流行的“国魂”意思也相近）。如果姑以“国学”统称之，则什么是国学、国学是否妨碍中国“走向世界”以及国学（或其后来的变体“中国文化史”）自身怎样走向世界都是当年学人与学术社会非常关注并一直在思考和争辩的大问题。就表述方式言，或可以说许守微1905年凸显的“国粹与欧化之争”是从“中西学战”到“中西文化竞争”之间的过渡阶段，三者基本同义。清季朝野各方在努力保存国粹的同时已对“欧化”采取既抗拒又包容的态度，民初学人大致继承了这一取向。由此视角考察从保存国粹到整理国故再到不承认国学是“学”这一蕴含复杂而发展曲折的演化进程，当更容易看出各派观念的异同所在。

总体地看，庚子后士人关怀的主要问题及许多具体论题、论点皆与甲午至戊戌维新时相类，有明显的继承性；但不同之处也清晰可见，主要因士人思想资源的扩充、日本的影响增强、戊戌后康梁的逃亡办报、杂志的大量涌现和留日学生开始较多发言等，而用以表述思想的术语尤可见明显的突破。当时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在共同的关怀之下却常常缺乏共识，比如当时一般人眼中的新旧双方（以及新旧阵营内不同的派别）大家都意在致用，而何为“有用”，所见却大不相同，这是时人言论分歧的一大关键。

本书即以讨论19—20世纪之交的思想关联为开端，主要探索甲午中日战争后开始的关于中学（旧学）是否有用、有什么用及什么才有

用等系列问题对庚子义和团之役后士人的影响，并因此产生关于物质文明与文质文明的区分和对后者的特别注重，复因中学（主要在物质层面）的“无用”发展到中国“无学”的认知，而中西学战的存在又不允许中国“无学”，结果导致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君学”与“国学”的区分和对“古学”的全面梳理（部分也因欲模仿西欧实行中国的“古学复兴”），最后由于古学难以包容西学而使更具开放性的“国学”或“国粹”这样的新术语得以流行。这一进程未必呈线性发展，但大体维持着一种逻辑的联系。

庚子后，士人多以为政府不足以救亡，因而不可恃，故朝野双方在政治上相当对立。但在文化方面，毕竟国粹学派的组织是国学保存会，其标志与同样明确以“保存国粹”为口号的“存古”取向非常相近；且双方都不同程度地倾向于中西调和的取向，对稍后所谓“欧化”取容纳态度，而非完全排斥；故当时朝野之间的冲突和紧张程度不像以前认知的那样严重，可见明显的共性。在朝廷的一面，张之洞所谓欲强中国不得不讲西学、欲存“中土”之认同又不能不讲中学那种曲折心态相当有代表性；在民间则有提倡开放的国学、强调国粹不阻欧化的国粹学派。两者的共性是大致遵循温故知新或“新故相资”的取向，希望走出一条鱼与熊掌兼得之路。

不过，官方与民间关于保存国粹的具体取向则颇不相同，且时常视对方为对立面，这一实际存在的冲突和对立无论如何不能轻视。本书也注意考察国粹学派与办理存古学堂的官方在保存国粹方面的实际努力及其观念异同。而且，当时仍有不少人更多看见国粹与欧化那冲突的一面。同样以欧洲为学习榜样的吴稚晖等提倡无政府主义者当时就认为中国“古学”缺乏可开发的思想资源，明确表示不赞同“古学复兴”，而主张直接走“欧化”之路。对特别强调“国家”存在意义的国粹学派来说，若弃国粹而欧化，结果可能是虽富强而文明却已非“中国”，故在清季最后几年本来对欧化持开放态度的国粹学派，特别是章太炎等人针对弃国粹而欧化的主张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其核心则在语言文字之上：始则贬斥“东瀛文体”，继而反对采用“万国新语”，这与清季语言文字

地位的上升有直接关系。

随着近代尊西趋新大势的强化，起源于传教士的中国文字难这一观念在许多中国士人中日益普及，且被认为是造成中国人识字率不高故影响“开智”的主要原因，因而出现了简化中国文字甚至再造中国新文字的主张，后者多与拼音化相关，更甚者则提出废弃中国语文而采用万国新语，在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鼓吹尤力。与此同时，由于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在清季最后几年的引入，前此不甚被看重的语言文字地位逐渐上升，被视为“国粹”的要素之一；故国粹学派所提倡的“古学复兴”，其一个重点即落实在语言文字之上。

语言文字是表述思想的工具还是构成民族或“国粹”的要素？它是否应为中国在近代中外国家竞争中的表现不佳承担责任？它能否影响晚清朝野试图改善中国在世界的地位这一共同的目标？如果能够，怎样影响？中国应该抛弃传统、减轻包袱、走直接“欧化”之路，还是寻求一条国粹包容欧化的“古学复兴”之路？这些问题在清季最后几年受到朝野共同关注，并引起激烈的观念竞争。如果一个物质上像欧美或日本那样“富强”、文化上像它们那样“文明”，但其认同上已没有多少“中华”成分的“国家”出现在东亚大陆之上，这个“国家”还是“中国”吗？用今日的话说，当实现中国“国家”这一实体富强（甚至“文明”）的目标与落实在中华民族之上的中国这一“民族国家”的存在发生冲突时，应该做出何种选择？

对于这些问题，当时的国粹学派和欧化派（皆取其大意）有着相当不同甚至对立的答案。而革命党人内部的对立有时甚至超过其与清政府的冲突，后者那时也在充满内部阻力的情形下尝试推行拼音化的“简字”。章太炎等人虽也曾受到无政府主义影响，却不能容忍用“万国新语”取代中文，结果形成一场革命党人内部的争论。此前，与语言文字密切相关的文体问题已成为朝野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在“东瀛文体”及构成此文体的重要特征“新名词”越来越流行于中国的同时，贬斥和抵制“东瀛文体”也日渐形成朝野一致的风气（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一致”是朝野共谋的，也未必是有意识的）。关于文体和新名词的争议

不仅反映了清季士人对一些基本思想和学术问题的见解，揭示出时人对日本这一敌国既试图效法又欲有所区别的心态，尤可见当时新旧的纠缠互渗已到较难区分的程度。

“国粹”一词被其主要的倡导者弃用，部分也因为他们本不认为中国传统一切皆“粹”，而提倡将传统区分对待，故曾重建出别于“君学”的“国学”。而且，国粹学派正是在试图区别于日本“国粹主义”之时隐约觉察到“国粹”这一新名词有些问题，并开始探索可否以其他更恰当的方式来表述“国粹”。章太炎便重新诠释了“国故”一词而使之流行，傅斯年后来指出，“国故一词，本为习用，即国朝之掌故也。乃太炎尽改其旧义”。然因“清末民初，人以国学二字为不妥，遂用国故”。<sup>〔1〕</sup>

五四后兴起的“整理国故”的努力，以其影响范围的广阔和参与者的众多，大致可以算作一场“运动”。而整理国故的主张甫提出便引起了争议，引发一场以北大学生为主的思想论争。与清季相同，论争双方的共同之处不少，尤其是继承了晚清学战的传统，特别注重“学”或后来开始流行的“文化”层面。就其既与学术相关然其关怀又超越于学术的特征而言，这次论争是从清季开始的系列论争的一部分，它上承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由此而起的争议，下启与“科学与人生观之争”同时及北伐之后两次关于国故和国学的讨论。

与清季关于国粹的论争相近的是，1919年这次论争已不是纯粹中西之间的学战，“一切以古义为断”的“大国故主义”已基本退隐，参与思想竞争的已是大致继承了清季保存国粹论者的中西调和取向而主张“国故和科学并存”的另一种“大国故主义”了。此后即使这样的旧派也逐渐淡出，到1923年初胡适和梁启超为清华学生开具“国学书目”，又引发一轮关于整理国故的新争论；这次再争论已不在新旧两派中进行，参与者基本皆新派人物，毋宁是一场新派内部试图整合观念的努力。那时不论支持还是反对整理国故之人都经常援引“科学”以为

---

〔1〕 傅斯年致朱家骅[抄件]，1940年7月8日，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承杜所长惠允使用。

助，像吴稚晖、康有为这样政治、文化立场都相当不同的老辈此时均特别强调中国急需的是“科学”的物质层面，而林玉堂（林语堂）等几位对“国学”认知不甚相同的年轻留学生却更注重“科学”的整体性（其实是更侧重其“精神与方法”），并进而提出了“科学的国学”的口号。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吴稚晖那时要反对的已是用西方观念武装的“洋八股”，可知咸同时一些士人主张的中学胜于西学这样一种“纯八股”观念已不能在民初的思想言说中立足而参与思想竞争，主张完全回向传统的取向即使存在，也如毛子水在1919年所说，因“错处容易明白”而没有多少反对或打击的必要。<sup>〔1〕</sup>由于“中学”先后以“国粹”或“国故”的表现形式重新进入中国思想言说的中心，一些新文化人发现此时“八股”又因“洋”的包装和支持隐而复显，两者的结合对中国的发展构成了新的甚至可能是更严重的“威胁”。吴稚晖便认为“洋八股自是一种当行出色的新国粹”，他最担心“若真真把线装书同外国文学配合成了洋八股，当此洋功名盛到顶点时代，那就葬送了中国，可以万劫不复”。<sup>〔2〕</sup>在西学掌握“话语权势”的时代，“国粹”若有西学为之正名，将难以破除打倒，这才是吴所惧怕的。

这也是导致一些新派学者转变态度的重要因素，他们在最初论证整理国故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时，基本不存“打倒旧文化”之意，但到北伐前后几年间却转而将整理国故与破坏性的“打鬼”联系起来。最具象征意义的是与整理国故有一定距离的文学研究会在1923年和1929年的《小说月报》上分别刊发两组相关文章，前者力图为整理国故正名，后者却激烈反对国学。其实在整理国故运动内部本存在一种从病理学的意义来看待整理国故的思路，以为通过整理可防治中国固有的疾病。沿此理路走向“打鬼”，甚而主张基本放弃整理国故，也是比较自然的发展，但新派学者这一态度的逆转主要还是与当时的世风密切关联，许多人正是基于整体性的新旧不两立的认知，为划清与“旧派”的界限而走上反

〔1〕 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新潮》1卷5号（1919年5月），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732—733页。

〔2〕 《吴稚晖先生来信》，《晨报副刊》，人民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1923年10月15日，2版。